



鼎红的小爱情

偏执于时代的「小」，这「小」，是微妙，是极点，是我们的神经末梢，也是好小说的「兴奋剂」。

庞余亮／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鼎红的小爱情

庞余亮/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鼎红的小爱情 / 庞余亮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 · 小说林)

ISBN 978-7-5068-3911-2

I . ①鼎… II . ①庞…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5317 号



图书策划 崔付建
特约编辑 陈 武
责任编辑 李国永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11-2
定 价 36.00 元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读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就好

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几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

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目
录

螃蟹为什么颤抖

001 ◀

越跑越慢

035 ◀

和痞子抱头痛哭

088 ◀

鼎红的小爱情

129 ◀

出嫁时你哭不哭

174 ◀

秒 史

211 ◀

十字正吊

250 ◀

螃蟹为什么颤抖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肯定有螃蟹，别看螃蟹们总是张牙舞爪横行霸道，可它们的原则一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有侵略者的时候，它们一边窝在芦柴根的下面数着自己吐出的气泡，一边防备着去芦柴荡中打棕箬的姐姐嫩芦根一样的脚。很多时候，我总是来不及惊呼，姐姐们的脚就踩上了那些螃蟹。这是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梦里姐姐们的脚总是鲜血淋淋。姐姐们脚上一道伤疤就是一个故事。所以，这次我还是准备讲姐姐们的故事，我的三个姐姐的故事。上次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的确凉的夏天》，发表了，被一个好事者告诉了我姐，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姐姐先知道的，反正后来三个姐姐都知道了。我的三个姐夫还对号入座，弄得我无法解释。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生活与小说不是一回事。有时我想，生活和小说又是一回事。写小说跟我们家小时候做芦柴席差不多。我们那儿水多，荒滩多，芦柴多。小调《拔根芦柴花》就是从我们那儿唱出来的，可芦柴花只能做不中看也不中用更不值钱的芦花鞋。要让这芦柴值钱，就必须做既畅销又值钱的芦柴席。芦柴成了摇钱树，以至于结婚的时候，通向新人家的路上都要铺

上芦柴的，新娘的脚踩到哪里，“发财”的声音就响到哪里。做芦柴席首先要用铡刀铡去芦花头，再给每一根芦柴开膛破肚，用石磙碾熟了，剥去芦柴衣，再一根一根地编织成芦柴席，芦柴席做好了，就用它去砖窑上换几百块砖。像燕子衔泥一样，先点滴再点滴。这是我们那儿每家每户的经营术。每年秋天，我们都用大镰刀把原先长在水里的芦柴割下，头发蓬松的芦柴花不见了，裹得紧紧的芦柴衣不见了，芦柴们就成了一张张平面的整洁的芦柴席了，其实这就像是写小说。

我的这个小说还有关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辈子的恩怨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只有一点，我父亲最后的净身是母亲和我完成的。母亲给父亲擦下身的时候擦得特别的仔细，待她擦完了，母亲又给躺在芦柴席上的父亲穿上了衣服，死去的父亲像是母亲怀里的孩子，任性而自私。母亲费尽了力气，而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谢，跟和生前的脾气一样。

平时要到生产队做工，而做芦柴的时间是利用一天时间的边角边料，母亲就特别盼望下雨，只要下雨，每个人都必须窝在家里，这样流水作业线的人员就齐整了。往往到了下雨这一天，母亲就会很大方地在锅里煮上一大锅面疙瘩，然后像妇女队长一样说，多吃些疙瘩，多吃些疙瘩，上午就开工。母亲负责铡芦花，用小抽钩给芦柴开膛破肚；父亲负责碾；我、素兰和爱兰负责剥柴衣；大姐红兰负责编织。大姐手快，常快得我们五个人都跟不上她的速度，刚见她坐在地上替一张柴席“起头”，一会儿就看见她在替这张柴席“塞边”完工了。如果是晴天，打谷场上的石磙子可以用，我们加把劲，在母亲的怒斥声中跟上红兰的速度是应该没问题的。而到了下雨的时候，开膛破肚过的芦柴要变“熟”，就需要用榔头捶，这是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但为了儿子的将来，父亲只有用榔头捶下去。一小把一小把，可速度还是慢，往往父亲还没捶熟一把芦柴，没有原料供应的红兰就坐在做了一半的柴席上发呆了。这样，母亲设计好的流水线就断了档，往往这时候，母亲的脾气就上来了，话就说不好听了。父亲听了，当然不舒服，手中的榔头落到地上的声音

也不一样了，战争的乌云就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了。不过，很多时候，母亲是忍让的，只要父亲手中的榔头发出异样的声音，母亲就不发脾气了，反而像哄我们一样哄父亲，母亲一软，父亲也就不好发脾气了。做芦柴席的流水线阻塞了一下，又顺畅地流下去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最早结束工作的母亲就会到厨房炒上一盆蚕豆，然后夺过父亲的榔头，对父亲说，去弄两蛊吧。父亲不让，母亲就会喊父亲的名字：周益民。母亲喊到第二遍的时候，父亲就站起来了，慢慢地跑到桌子边“弄”酒去了。

那些下雨的日子里，也有母亲不让父亲的时候。与父亲的慢速度相反，母亲的动作就很快，抽柴抽得飞快，只见她手一拉一拉，一根芦柴就被开膛破肚了。当时我负责把母亲抽好的柴抱到父亲的身边。父亲依旧在不紧不慢地捶，有一下没一下的。母亲看了父亲好几眼了，父亲还是这样，母亲就忍不住了，说，周益民，我跟你换。父亲不吱声，不吱声表示否定。父亲还在有一下没一下的，他只能捶柴，他的手不能剥柴衣，不能抽柴，一剥一抽就会有芦柴刺戳到手中去。母亲越是着急，父亲越是不紧不慢，还放了一个屁。我们还没来得及笑，父亲手中的榔头就飞了起来，落了下去。榔头柄断了，父亲的一屁把榔头打断了，这样的喜剧就是父亲主演的，还经常上演，我们都笑翻了，而父亲一脸的严肃，他是天生的喜剧演员，有时候，很少笑的母亲也会被他逗笑起来。

榔头总是坏，谁也不能怀疑父亲在上面做了手脚，流水线要延续，就得到邻居王四妈家借，我们都抢着去隔壁王四妈家借榔头，但这样的好事往往被母亲指派给爱兰。爱兰很不情愿，有时候借的时间长，有时候借的时间短，不管时间长短，母亲都会骂爱兰。爱兰不怕骂，说起刚才去借榔头的种种细节，有些细节明明就是爱兰自己编的，可我们相信，实在太无聊了。就在我们这边闹笑的同时，父亲在那边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捶着芦柴，圆滚滚的芦柴在父亲榔头下咯嚓嚓地碎裂着，躲避着。父亲说，这榔头怎么这么生？父亲话没说完，他又放了一个屁，我们没有笑。不一会儿父亲又放了一个屁，我们看了看正沉着脸抽柴的

母亲，还是没有笑。父亲又放第三个屁了，他不但放了，还自我解嘲地说，苦了，苦了。再后来，父亲又放了一个屁，屁还没有放完，他就押韵似地说了句，苦了，苦了。我们都忍不住了，噗哧一下笑了起来。大姐没有笑，可最不爱笑的母亲也跟着笑了起来，居然是母亲笑得最厉害，说，苦了苦了，你是生孩子还是罱泥了？母亲这么一说，我们笑得更厉害了。我们没想到父亲会生气，他把木榔一撂，木榔头的头在地上扭了一下就不动了。父亲说，还笑呢，笑什么，看看你们的狗牙，你们长了一副狗牙，难看死了。父亲边说还露出他的碎米牙，一脸的鄙夷。我们不笑了，用嘴唇把牙齿抿了起来。母亲也不笑了，她一手握着小抽钩，小抽钩咬着一根芦柴，卡在了那里。喜剧结束了，悲剧正在上演，我们都低下头去假装找事做，再抬头就发现母亲已经扑向了父亲，狗×养的，你倒嫌起我来了，你嫌我丑当时你不要用八大轿把我抬来啊，父亲被母亲揪住了衣领，父亲的手握住了母亲的手，说，你丢不丢手？你丢不丢手？母亲说，狗日的，你打啊，你不打你就不是你娘养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冲向了父亲，我们家的战争就要爆发了。

母亲不怕父亲骂她懒，也不怕骂她笨，就怕父亲骂她丑。父亲这样骂，就等于打母亲的脸了，当然也等于在骂我们。父亲长得很英俊，可素兰、爱兰和我长得都不像父亲，都长了母亲的翘牙齿，而不是父亲的碎米牙。为了一只榔头而引起的战争最终没有爆发，不是因为母亲放弃了，也不是因为父亲害怕了，在那个关键时刻，父亲又放了一个长屁，这个长屁既救了父亲也救了母亲。父亲放了这个长屁后就把母亲的手用力一摔，丢手！老子要出恭。母亲就丢了手。地上的芦柴散得东一根西一根的。父亲到灶后抓了一根稻草就出门去，出恭去了。母亲铁青着脸回房睡觉了，她和父亲打了架就喜欢睡觉，打得越厉害她睡觉时间就越长。

母亲一走，家里就出现了权力的真空，一直伏在地上做柴席的红兰就站起来说，刚才谁先笑的？我说我没有。红兰说，四丫头，我晓得不

是你。红兰把目标锁定好了素兰和爱兰。素兰和爱兰把头低下去。红兰用脚踢素兰。素兰说，不是我。一直低着头的爱兰就站了起来，用脚把刚才顺好的芦柴又踢乱了，就是你，还拉我垫背呢。素兰把手中的芦柴抛了起来，有的柴衣就落到了爱兰的头发上了，素兰说，你这个小哭×！如果不是你的小×先咧开来他们会打架？红兰个子高，她一手抓着一个，都抓住了她们的头发，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小婊子。爱兰和素兰不约而同回骂了声：大婊子。红兰长得很像父亲，用王四妈的话说，是有脸盘子的。一听她们骂，红兰的脸就变白了，变白了脸的大姐更好看了。爱兰补了一句，卖豆腐，王必贵！眯眯眼，王必贵！做豆腐的王必贵是红兰定了亲的未婚夫，他没有长一副翘牙齿，却长了一副眯眯眼，不知道他是怎么在黎明的黑暗中做豆腐的。这是红兰的软肋，红兰一听王必贵就泄了气，也回房睡觉去了。三个主力干将不在了，只剩下三个虾兵蟹将。最大的素兰什么命令也不下，依旧在维持流水线，爱兰没有这样做，站起来，拍拍身子，说是肚子疼，然后就冒雨出去了。素兰看着她的背影，唾了一口，吃家饭不屙家屎，把屎橛子往外衔的骚×！

吃家饭屙家屎，这是母亲从小对我们四个人的教育原则。我很热衷于听关于父亲与那些小姨娘的故事，有时候我还暧昧地提醒人家，人家就开始吞吞吐吐地说，还遮遮掩掩，所以有段时间我脑袋瓜里全是父亲与那些摸不着边际的小姨娘们的故事。我没有亲姨娘，但那些和父亲有过一腿的小姨娘在哪里？我不能问父亲，也不能问母亲，我一问无疑会遭一顿菜瓜吃吃。我才不这么傻呢，好在我们庄上总有一批自称为我姐夫的人，他们总是称我为小舅子，小舅子，我告诉你我老丈人的故事。那些自称为我姐夫的青年，他们大多脸上长着骚疙瘩，嗡声嗡气地围着我家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有姐姐的人都应该记得起来，家里有姐姐，外面总有几只癞蛤蟆在跳来跳去，况且我有三个姐姐呢，他们最后都转到我这儿来了。我母亲叫我四丫头，我父亲叫我永刚，那些苍蝇们叫我小舅子，小舅子，小舅

子，来叫我一声姐夫。我就把手一伸，他们就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献给我了。最后他们还忘不了问一句，王必贵是不是你姐夫？我说，不是！那些苍蝇还问，那又是谁？我又伸出手来，然后又说，你。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卖国求荣的行径是如何传到红兰的耳朵里的。有一次，父母不在家时，红兰用一根扁担把我逼到西房里，四丫头，你说，你叫了多少？我有点吓住了。红兰又说，你怎么叫的？我全都说了。我还说出了父亲与那些小姨娘的故事。我说，我是不是以后只能叫王必贵一个人姐夫？红兰板着脸说，四丫头，你没有姐夫，你什么时候有姐夫的？我看着红兰好看的脸，不敢再说话了。

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有未婚姐夫的小舅子每年都要拎着一包茶食到姐夫家请姐夫到自己家里“歇夏”。歇夏，伙食就要改善一下。这也是我愿意被父亲差遣去接眯眯眼王必贵到我家“歇夏”的原因。我比较喜欢王必贵那个做豆腐的妈妈，父亲让我叫她姨娘。我一走进王必贵家的门，看到全身豆腐味的王必贵的妈妈，就大声地叫姨娘。叫一声姨娘后她就会给我五角钱，五角钱啦，母亲给我一分钱都要抽筋，而这个姨娘一下子给了我五角钱。我愿意带王必贵到我家歇夏，我知道，我愿意带五角钱回家来歇夏。红兰对于我的表现肯定是知道的，可她没有办法给我五毛钱，有时候，我也恨自己，为了五毛钱，我就成了叛徒王连举。想想当年我做如此使者的样子，我就知道我如今为什么生活还没有高尚起来的原因了。

那一年夏天，我头上害了许多“暑痘子”，一颗消下去了，另一颗又冒了上来，父亲又让我去接王必贵，我不肯。父亲说，戴个草帽去。王必贵正在家里晒“浆布”，一条一条的，我拨了好几条才找到眯眯眼王必贵。王必贵的妈妈不在家，我把王必贵带回来了，可并没有带五角钱回来。王必贵睡觉很不老实，夜里磨牙，吱吱吱吱吱，像只大老鼠。第二天晚上我死活不肯跟王必贵睡，父亲要打我，母亲不让打，我躲到红兰的房里去了。父亲和母亲低着声在吵，第二天早晨母亲就没有

起床烧早饭。第二天早饭是红兰起床烧的，王必贵也早就起来了，他想扫地，素兰扫了。他想挑水，素兰和爱兰把水早抬满了。他又想抹桌子，爱兰早就抢过去抹了。一切都是无声无息的，不想劳王必贵的大驾。所以王必贵早上只是老老实实地坐在桌边等早饭吃。就在那天早晨，红兰把粥碗往王必贵面前一放，说，王必贵，说你呆吧，你又不呆，说你尖吧，你又不尖，你为什么不回家帮你妈做豆腐。王必贵本来就不必抬头看红兰，他低着头在桌子下面左手握着右手，使劲地握。父亲咳了一声，红兰，你这是什么话？红兰说，中国话！父亲又把桌子一拍，桌上的碗筷都跳了起来，反了你，人家可是送了定亲礼的。红兰说，谁收谁嫁去。王必贵都听见了，可他回家后好像什么也没说。八月半王必贵的妈妈又笑盈盈地过来送礼。父亲让我叫她姨娘，我没有叫。王必贵的妈妈又把带有豆腐味的五角钱递了过来。父亲又回屋去叫，红兰，红兰。过了不久，爱兰出来说，大姐头疼。父亲说，红兰最能干了。王必贵的妈妈说，那是，那是，我家必贵有福气，红兰他妈呢？父亲说，她啊，她去场上捆草去了。父亲说谎真是本事，一点也不脸红，母亲昨晚上又与父亲打了一架，这时正睡在床上抗议呢。

父亲把红兰的不听话归结于母亲，母亲把红兰的不听话归结为父亲。整整一个初秋，红兰像被打错了农药的棉花，叶子蔫了，花瓣也落了一地，一张嘴撅得快要挂油瓶了，但八月半一过，原先蔫不拉叽的红兰又神气起来了，因为大队里文娱宣传队又要排戏了。依红兰的脸盘子即使不演《革命一家人》里的女民兵，也要唱《逛新城》里的女儿。有时候红兰会同时唱两个戏，柴席就做不成了。好在素兰、爱兰也会做。从九月到十二月，文娱宣传队一共要排四个月的戏。戏排好了，腊月里文娱队就要连庄连村地演出了。有的大庄会用船上的跳板和竹篙搭成戏台子；有的小庄不搭戏台子，就画一个圈权当戏台子，反正就是图个热闹而已。有戏台的庄会演《革命一家人》的，红兰把头发弄乱了，还用红颜料把嘴角涂出血来，这都是被敌人打的。我不太喜欢看这出戏，这

个戏把红兰演丑了。我最喜欢看的是《逛新城》，《逛新城》一般在不搭戏台子的地方演。民办教师顾国富扮阿爸，红兰扮女儿。阿爸扎着白毛巾涂上黑胡子追着女儿老态龙钟地转圈，边转圈边气喘吁吁地叫，女儿哎，等等我。女儿就唱，阿爸哎。阿爸就会大声地答，哎！等到一过门时阿爸还和女儿一起唱，快快走啊快快走，社会主义新城逛不够。每次演出，围着圈子的观众会把演出圈越挤越小，弄到最后，已不是阿爸和女儿一起在追趕着逛新城了，而是在并肩行走了，那种默契，谁都看得出来。

事件是王必贵自己捅破的，一捅破之后，王必贵就被红兰打了一个后脑勺。很多人都听说过了，我家人却不知道，还是王四妈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我父亲使劲地摇头，不可能，听他们瞎嚼蛆，不可能，换成爱兰倒有可能，红兰不可能。再说了，红兰打其他人倒有可能，打王必贵怎么可能？笑话！造谣！笑话归笑话，造谣归造谣，村里说闲话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苍蝇遇见我就问我，喂，小舅子，听说红兰打了王必贵几个耳光呢。再后来爱兰回家说，听人家说红兰一巴掌，差一点把王必贵的头打下来呢，好像红兰成了大力士似的。那时红兰还在文娱队上，看不出她差点把人头打下来的迹象。后来，王必贵的妈妈还顺路送了几块豆腐干做的素鸡，然后又走了，也没有谈到王必贵的头被打下来的事。那几天，红兰正在邻庄的戏台上演着《革命一家人》。待红兰回家时，父亲差不多已经把王必贵妈妈送的素鸡吃下肚了。红兰的感冒好像全好了，一下子就闻见了做豆腐的石膏味。红兰说，谁喜欢这么吃屎？母亲搭了红兰一句，爱吃屎的人吃屎。这句话等于是废话。父亲好像没有听见，他对红兰说，红兰，大演员，人家王必贵哪样对不起你。红兰没有答话，跨进房门睡觉去了。父亲拍了拍桌子，大演员，你凭什么打人家耳光？母亲说，你就省句吧。父亲又拍了拍桌子，老×，都是你教的，不是你教她敢这样？父亲真的喝多了，他喝多了酒就是不停地说，我们都必须是他的听众，听他说，听他痛说革命家

史。他母亲怎么病死的，他父亲又怎么死的。他苦啊，他这么苦，还要养这一家子畜生。父亲说到最激动处会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母亲在父亲的哭诉声中低声地争辩道，反正不是我拖油瓶带过来的。

那些苍蝇们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姐夫们讲了很多幸灾乐祸的不同版本。不过地点是一致的，那是王必贵的庄上。那时红兰所在的文娱宣传队来到了王必贵所在的庄上。王必贵的庄上没有搭戏台，红兰和顾国富一起在演《逛新城》。本来用石灰画好的场地被越挤越小，有人还趁机朝红兰身上挤。顾国富和红兰演着演着就开始偷工减料，愈唱愈短，他们只是急于把《逛新城》逛完。结果有一个人就急急地闯了进来，还闯到了顾国富的身上。周围的人起哄，女婿给丈人拜年来了，顾国富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眯眯眼王必贵。而撞了人的王必贵一点也没有道歉的样子，好像不是他撞了顾国富，而是顾国富撞了他似的。顾国富没有说什么，红兰说，你怎么这么不文明？王必贵一听，眼睛更小了，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不文明？你们俩就文明？红兰一个巴掌就打过去了。顾国富说，永刚，你说王必贵好玩不好玩？红兰一巴掌打过去，竟把王必贵打哭了，小眼睛里麻油倒不少。我回过头看红兰，红兰正在灯下用自己的和顾国富的旧衣裳给顾蕾做尿布，不否认也不肯定。

父亲一直认为是民办教师顾国富勾引了他的大丫头红兰。父亲在谴责顾国富的时候，还给顾国富开出了苛刻条件，第一个条件，红兰要跟王必贵家退亲，必须一个子一个子地退钱和贴钱，所退的钱和所贴的钱由顾国富负责。这些钱是由王必贵的妈妈过来算的，她还记得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全是用在“红兰身上”的钱，当然包括给我的钱，甚至还有一笔给我买玻璃球用的五分钱，这是王必贵主动买给我的。一共是贰仟叁佰壹拾玖元陆角肆分。第二个条件是红兰结婚出嫁时，我父亲为捏锁封儿的事漫天要价，要了天价一百块，让顾国富的新娘子轿子船迟发了三个小时，等新娘子入洞房时天已经黑透了。第三个条件父亲做得更绝，新娘结婚娘家人要组织亲戚去新娘子家“望朝”，我父亲不顾母亲

的反对居然请了很多包括多年已不走动的远房亲戚去“望朝”，人數计有十二桌。父亲对素兰、爱兰说，红兰这是咎由自取，这都像对阶级敌人说话了。父亲还警告母亲，不要里通外国。父亲还不允许我们在家里提红兰两个字。

红兰一满月，就和顾国富的妈妈分了家，还分了债。结婚回门，什么东西没有带回来，还把家里的她留下的旧衣服带走了。本来是她嫌式样旧的几件，有一件被素兰换着穿了，然后脱下洗了晾在绳上的也被红兰扯走了。王四妈说，姑娘都是偷娘家的，真是十个姑娘九个偷。红兰一点也不像那个《逛新城》的女儿了。

红兰做了一个好听不中用的顾师娘，我家少了一个劳力分。原来是三个劳力分，现在一下子去了一个劳力分，还划走了红兰的一份自留地。里外里损失了很多。加上父亲不常出工，年终分红我家就超支了。超支那年我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喝多了酒，一点也不想顾忌什么了，他开口大骂他自己，骂母亲，骂我们。我母亲还是那句话，又不是我拖油瓶带过来的。

那段时间可是我最寂寞的时期，好像是我的冬天，夏天赶都赶不走的苍蝇都一下不见了，素兰、爱兰长得像母亲，而不像父亲，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素兰比红兰差三岁。爱兰比红兰差四岁。我比红兰相差七岁。这一差，把我家门口的苍蝇差了个一干二净。他们都去围剿别人家了。我家得给王必贵还钱。顾国富为此还给父亲打了欠条。我家连砌瓦房的一万砖都卖掉了。母亲一提钱就说，那个寡妇是个笑面虎，扫帚星，卖玻璃球的五分钱还记得，真是好意思呢。父亲听见了会铲上一句，还说人家好意思呢，你养的女儿你好意思，反正我没脸见人了。后来他们就吵起来，打起来。王四妈来拉也没用。父亲骂母亲，母亲也骂父亲。话都说得非常难听，有时候父亲不吱声了，母亲仍像愤怒的螃蟹一样骂着什么。

父亲不肯出门了，也不允许母亲出门，更不允许素兰和爱兰出门，